



2016 · 第3卷

日本侵华史研究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南京出版社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日本侵华史研究

(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学术顾问

汤重南 张 健 刘江永 张伯兴 张宪文 朱成山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张建军

副主任 邵建国 翟 新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卫星 王伟民 孙宅巍 艾德林 朱同芳 张 生

张连红 张建军 孟国祥 陈俊峰 邵建国 经盛鸿 侯曙光

徐康英 程永明 曾向东 翟 新

主编 张建军

执行主编 曾向东

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第3卷 / 张建军主编.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6.9
ISBN978-7-5533-1520-1

I. ①日… II. ①张… III. 日本-侵华-历史-研究
IV. ①K26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916号

书 名: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第3卷

主 编: 张建军 执行主编: 曾向东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ppcpalm@126.com

责任编辑: 朱天乐 装帧设计: 肖千浩 外文翻译: 【英】王晓阳 【日】芦鹏 【韩】金海燕

印刷: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8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533-1520-1

印数: 2000册

定价: 20.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研究

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秘密生化武器研制及战争实施……………经盛鸿 经姗姗(1)

南京大屠杀中在南京回族的劫难……………洪 伟(13)

学术探讨

明治中期日本对中国的探索 and 认知

——以《禹域通纂》和《清国通商综览》为例……………徐静波(21)

从日本史料看有关九一八事变的几个问题……………石 岩(32)

“日本八路”历史叙事下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国民心理构造分析……………张焕香(41)

简论台儿庄战役的时空范畴……………宋胜健(50)

从《终战诏书》看日本的“二战史观”……………王晓阳(55)

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有关江苏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述评……………肖晓飞(62)

文物评析

“松下富贵楼”内窥器: 侵华日军实施

“慰安妇”制度的重要罪证……………王伟民 李忻悦 孙红亮(72)

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正式设立时间考证

——基于日本新发现的细菌战档案调查与研究……………宫文婧(82)

域外研究

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再检讨 【日】 瀨 厚 文 李若愚 译 (87)

相关史研究

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机构剖析 宋伟宏 滕 飞 (95)

长春：倍受侵略者蹂躏的城市 沈 燕 (101)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藏旅顺要塞地带标刻石考略 崔再尚 (107)

书评

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新视角

——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孙宅巍 (112)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与国难的全息纪录

——读关捷、关伟编著《日俄战争灾难纪实》 安成日 (118)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Main Contents

2016 No.3

Secret Biological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War in Nanjing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Jing Shenghong Jing Shanshan (1)
Nanjing Massacre in Nanjing about Hui People	Hong Wei (13)

Mid-Meiji Japan Exploratory and Cognition to China- Take the "Chinese Text Project" and "Qing Trade Overview" as an example	Xu Jingbo (21)
Analysis of Several Programs about Mukden Incident from Japan's historical Data	Shi Yan (32)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against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alysis under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Historical Narrative during the War of Aggression	Zhang Huanxiang (41)
Discussion about the Scope of Time and Space about Taierzhuang Battle	Song Shengjian (50)
Discussion about Japan's History Concep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the "Gyokuon-hōsō"	Wang Xiaoyang (55)
Review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Academe on Jiangsu Anti-Japanese Base Are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Xiao Xiaofei (62)

The Speculum of the Matsushita Fuguilou "Comfort Station" : The Important evidence of Japanese Aggressors "comfort women " implementation system	Wang Weimin Li Xinyue Sun Hongliang (72)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Unit 1855's Formal Establishment Time	Gong Wenjing (82)

Review of Japan's War Responsibility Again	[Japan] Koketsu Atsushi Translated by Li Ruoyu (87)
---	---

Analysis of Colonization Mechanism of Manchukuo	Song Weihong Teng Fei (95)
Changchun: a City Ravaged by Invaders	Shen Yan (101)
Study of Collections on Lvshun Fortified Zone Marked Stone of Lvshun Japanese-and Russian Prison Museum	Cui Zaishang (107)

The New Vision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Research: Review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History Research"	Sun Zhaiwei (112)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Imperialist Powers Scramble and National Calamity: review of "Russo-Japanese War disaster documentary" edited by Guan Jie and Guan wei	An Richeng (118)

日本侵華史研究

2016 No.3

目次

南京における日本軍の生物兵器の開発及び戦争での実施.....	経盛鴻 経姗姗 (1)
南京大虐殺における南京に在住する回族人の被害	洪 偉 (13)

明治中期における中国に対する日本の探察及び認識 ——『禹域通纂』と『清国通商総覧』を例として.....	徐静波 (21)
日本の史料から見る九一八事変の諸問題	石 岩 (32)
「日本の八路」の口述物語から見る中国侵略する時期の 日本国民の心理構造	張煥香 (41)
台児荘戦役の時空範疇を論ずる.....	宋勝健 (50)
『終戦詔書』から見る日本の二次大戦史観	王曉陽 (55)
改革開放以来の江蘇省敵後方の抗日根拠地に関する研究を論ずる	肖曉飛 (62)

松下富貴楼の「内視鏡」：日本軍「慰安婦」 制度の重要な証拠物	王偉民 李忻悦 孫紅亮 (72)
華北（甲）1855部隊の設立時間についての検証 ——日本で新たに発見される細菌戦史料に基づいて	宮文婧 (82)

日本の戦争責任の再検証「日本」	纈纈厚 文 李若愚 訳 (87)
-----------------------	------------------

偽満州国の植民統治機構についての分析	宋偉宏 滕 飛 (95)
長春：侵略者に蹂躪された都市	瀋 燕 (101)
旅順日露監獄旧跡博物館に収蔵する旅順要塞地理標示石について	崔再尚 (107)

南京大虐殺を研究する新角度 ——『南京大虐殺史研究』を評する	孫宅巍 (112)
帝国主義列強の奪い合いと国難の全記録 ——関捷、関偉編著『日露戦争災難の記録』を読む	安成日 (118)

일본군이 난징에서의 비밀생화학 무기연구제작 및 전쟁실시	정성홍 정산산 (1)
난징대학살중 난징회족의 재난	홍웨이 (13)

메이지중기 일본이 중국에 대한 연구와 인식	
——《우역통찬》과《청국통상종람》을 예로	서정파 (21)
일본사료로 보는 9.18사변의 몇가지 문제	스옌 (32)
《일본팔노》역사서술하의 침화전쟁시기 일본국민 심리구조분석	장환상 (41)
타이얼창전역의 시공범위를 간단히 논함	송승건 (50)
《옥음방송》으로부터일본의 《2차대전사관을보다》	왕소양 (55)
개혁개방이래 해내외 유관 강소성 적후	
항일근거지 연구 서술평가	소소비 (62)

“마쓰시다부귀루”내시경기구 :	
침화일본군 “위안부” 실시제도의 중요 죄증	왕위민 리신웨이 손홍량 (72)
화북(갑)1855부대정식설립 시간 고증	
——일본이 새로 발견한 세균전 서류조사와 연구	궁문경 (82)

일본전쟁책임에 대한 재검토	[일] 고우게즈아즈시 글 리눠우 번역 (87)
----------------------	---------------------------

위만주국의 식민통치 분석	송위홍 등비 (95)
장춘:침략자의 유린을 배로 받은 도시	썬앤 (101)
려순일러감옥구적박물관이 소재한 려순	
요충지대표 비석 고증	최재상 (107)

난징대학살연구의 새로운 시각	
——《난징대학살연구》를 평함	순자이웨이 (112)
제국주의 열강쟁탈과 국난의 기록	
——관제이,관웨이가 편찬한 《일위전쟁재난기록》을 읽고서	안성일 (118)

侵华日军在南京的 秘密生化武器研制及战争实施

经盛鸿

经姗姗

摘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违反国际公法,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与毒气战,给中国军民带来了重大的杀伤与长期的危害。日伪统治下的南京成为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与毒气战的一个重要试验与制造基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绝不只是大屠杀。驻哈尔滨的日军七三一部队所进行的生化试验、细菌培植、活人体解剖等种种罪恶行径,驻南京的日军第一六四四部队同样日夜在进行。但时至今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推行的细菌战与化学战政策及战争实施罪行,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与严肃的审判,这是历史留下的又一大遗憾!

关键词:侵华日军;南京;生化武器;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

作者简介:经盛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南京,210097;经姗姗,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南京,210097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了违反国际公法的细菌战与毒气战,给中国军民带来了重大的杀伤与长期的危害。南京不幸,又成为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与毒气战的一个重要试验基地。诚如一位了解内情的日本证人所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只是一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所进行的人体实验、活人体解剖、细菌培植的行径,在南京同样也日夜在进行”。^[1]

一、日本的生化武器国策与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建立

生化武器是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合称。生物武器亦称细菌武器,是一种有致病、致命特性的有害细菌生物制剂;化学武器是指能毒害人的神经与器官并致人于死地的化学毒气。生化战,就是利用生物武器或化学毒气对敌方军队与人民造成大规模杀伤并造成严重后遗症的作战,显然都是违反基本的人道主义与践踏国际公法的战争犯罪行为。早在

1925年,世界多国就共同签署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气及细菌方法议定书》,明令禁止生产与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政府与人民都对毒气战与细菌战进行严厉的谴责。

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前半叶的疯狂对外扩张与发动战争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常常无视国际公法与人类的起码行为准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地实施与推行一些残忍的、骇人听闻的殖民战争政策。毒气战与细菌战就是其典型的表现。尤其对于细菌战,日本军政当局一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与积极的实施。当1925年世界多国签署《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气及细菌方法议定书》时,日本政府公然拒绝参加,并表示使用细菌武器是小国对付大国的有效的战争武器。日本是当时世界上对生物科学与细菌医学研究投入最多、水平最高的国家。为了准备实施细菌战,日本军政当局更加目标明确地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进行各种细菌武

器的培植、试验与制造。

当日本当局在1928年秘密制订吞灭中国的“田中奏折”侵略计划时,在京都卫戍医院任职的大尉军医石井四郎就向当局献计说:“缺乏五金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分析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的第一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杀伤力远比炮弹为广,死亡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适合。”^[2]

石井四郎于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在1924年到1926年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细菌学与病理学。他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使用化学毒气武器所深深吸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专门成立了一个对欧洲列强使用化学毒气武器的“调查委员会”,石井四郎参加了并专门到欧洲与苏联作了考察,形成了系统的细菌战武器思想:用最少投入,可以获得最大的战争效果。

日本当局迅速接受了石井四郎的建议,把细菌战定为日本的国策之一,并任命石井四郎为细菌战研究的领导人。石井的理论——“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3]成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与殖民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1930年,在日本军部的领导与支持下,石井四郎在东京军医学校组建了第一个细菌武器研究机构——“细菌研究班”,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积极向关内进犯。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当局于1932年8月晋升石井四郎为少佐,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1933年,日本关东军指示石井四郎在黑龙江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细菌战剂工厂与人体试验室,在哈尔滨南岗设防疫给水部本部,称石井部队,对外称加茂部队。1936年根据裕仁天皇的飭令,石井四郎在哈尔滨东南郊平房镇建立一个大规模细菌战研究基地,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8月改称为“七三一部队”);同时在长春南郊孟家屯建立“第

100 牲畜及农作物细菌作战部”,共同开展细菌战的全面研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有18个师团配备了细菌战人员,“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

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与持久,日军陆军参谋部在1937年底新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秘密间谍性阴谋破坏与杀人活动的谋略性机构——第九技术研究所,亦称“登户研究所”。该所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多摩河畔。其策划与指挥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关内地区组建新的生物武器研究生产基地与研究生产网络,先后在华北、华中与华南建立了三大防疫给水——生物武器部队:1938年2月在北平建立“甲字第一八五五部队”(又称“北支防疫给水部”);1939年4月14日在南京建立“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又称“中支防疫给水部”);1939年8月在广州建立“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又称“南支防疫给水部”)。这三支“部队”实际都是大规模的生物武器研究基地。在这三个基地之下,又在华北、华中与华南数十个中等城市建立生物武器研究分部,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太平洋战争以后,该所于1942年3月又在新加坡建立“冈字第九四二〇部队”(又称“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在东南亚各国设立支部。这些新设立的生物武器基地的技术性指导仍是石井四郎。石井四郎自称:“除指挥关东军细菌战部队外,还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的细菌战部队”。^[4]

由次可知,南京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是日本当局推行罪恶的生物武器政策、发展生物武器中的重要一环。著名的美国细菌战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教授在其《死亡工厂》一书中,称它是日本“细菌战研究网络”中“第三个主要的环节”。^[5]南京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成立于1939年4月14日。它是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的直接指挥下,由石井四郎带领哈尔滨“第七三一细菌战部队”的一部分人员与设备、器材来南京创建的。它对外称是日军“华中防疫给水部”,又称“石井(四郎)部队”,其任务表面称是“为维护日军士兵健康,预防传染病,或对侨民进行防疫检查,预防注射,总之是预防疾病而设立;另外,在作

战时,组织给水班,供给作战部队净水”。^[6]但这只是它的副业。它实质上是一家大规模的细菌战与毒气战研究机构,尤其是研究、试验与生产各种致命细菌战剂才是它首要的与最主要的任务。“荣字第一六四四”是这支特殊部队的代号,1943年以后改称“登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它对外还一度称为“石井部队”,后称“多摩部队”或“桧字部队”。据说“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这一数字来历同石井四郎及七三一部队相关,“1与6之和为7,3与1之和为4”,“一六四四”中的第一个数字“1”(い)和最后一个数字“4”(し)的日语发音为“石”(いし)。可以说“七三一部队与南京一六四四部队是表里一体”。^[7]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总部设于南京城内中山东路路北,原陆军中央医院旧址(现为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与南京无线电厂所在地)。这里马路对面(路南)就是明故宫飞机场;东面是伪政权设立的绥靖军官学校(后改为汪伪中央军校),再东就是中山门;西面是市中心大行宫、新街口商业区,日商云集此地,并有一条市内铁路通过;西南面是日军航空队宿舍。可谓是军警环绕,十分安全,对外交通联络又非常方便。“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除有多辆汽车、卡车外,还有自备飞机3架,起降于总部对面的明故宫飞机场,为运送人员、器材设备与细菌战剂带来极大的方便。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总部大院占地广阔,四周环绕着3米高的砖墙,墙上架设着铁丝网和几股通电的铁丝。大院内驻扎着一支精锐的警卫部队,武器精良,还配有警犬,每天24小时在大院内外巡逻,戒备森严。大院南门入口处挂着一块“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的木牌,以掩人耳目。大院内的主要建筑是两座大楼。主楼邻近大院南门,有6层,是司令部大楼。“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部队长室及各行政管理办公室设于此楼。副楼有4层,却是整个“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心脏,因为细菌武器与毒气武器的试验都在这里进行。

除这两座大楼外,本部大院内还有食堂、仓库、细菌战训练用营房以及健身房、游泳池、礼堂、兵器库、衣类消毒所、图书馆等各种设施,以及一座专门用来处理实验动物和人的遗体的焚尸炉。

另外,在距本部大院西北约1千米的太平门内九华山下,还设有一家细菌战剂生产工厂,对外称“血清疫苗厂”,实际上生产血清是次要的,主要是生产细菌战剂。

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刚创立时,第一任部队长由石井四郎兼任。不久,在1941年2月,石井四郎因工作繁重不能分身,乃辞去此兼职,改由石井四郎的密友增田知贞担任部队长。5个月以后,增田知贞奉命回东京担任陆军军医大学教官。第三任部队长是大田澄,他从哈尔滨“七三一细菌战部队”第二部即作战部部长的职位上调来南京,于1941年7月到1943年2月在职。第四任部队长为佐藤俊二,他原是广州“第八六〇四细菌战部队”的部队长,在南京任职期是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最后一任部队长为山崎新,从1944年3月接任,直到日本投降。这后几任部队长也都是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的“专家”,是石井四郎的部属与门徒,与石井四郎一样,也都是细菌战的罪犯。

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总部的机构主要有总务部、防疫科、材料科、理化学科与经理科。“总务部管理部队全部事务以及人事、教育、指导等事项。防疫科掌管细菌检验、培养、传染病防疫及其它防疫业务。材料科掌管各种卫生材料、给水器具及其它一般材料业务。理化学科主要负责毒物检查、制造预防注射液、水质调查和理化方面的研究。经理科主管部队的财务”。^[8]无疑,其中的防疫科是一六四四部队的核心机构。该科又称第一科,是专门从事细菌的研究、试验与培植的。“该部队内之第一部(科)则系主管特殊研究与实验等秘密工作,即系选择国军俘虏而将各种病菌药品注射其身体内,作为实验研究,前后致死者甚多,但因其极端秘密,除该第一部人员外,则无从知悉其详情”。^[9]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上直属于日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所——登户技术研究所;在它的下面,在华中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上海、苏州、常州、杭州、九江、南昌、安庆、汉口等地设立了12个分部。总部与各分部的工作人员总数达到1500多人。

日军当局与石井四郎对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细菌战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一方面

是因为“石井及其追随者们要在一种与满洲完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试验新的病原体”；更重要的是因为南京与华中地区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位置，这里是中、日军队长期对峙与作战最多的地区，是“能够证明细菌武器作为军事武器的价值的更大的舞台”，^[10]是对中国军队进行打击与威慑的最好地区。日军当局不仅给“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配备了最好的营区、房屋、设备、物资，而且提供了超常的、充足的经费。据曾在“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担任“军画兵”的石田甚太郎回忆说：“也许是负有开发化学武器的特殊使命，我听说这支部队的规模虽然只有一个营，但它的经费却相当于一个团的份额。寄往部队的军事邮件只需写‘荣一六四四部队’便寄到，由此也可看出这支部队的特殊性。”^[11]“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细菌研究需要的大量小动物，如小白鼠等，也由日本当局从日本本土源源不断送来。

由于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违反国际公法的战争犯罪行为，因而“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其研究工作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不仅在部队营区四周岗哨林立，警卫森严，严禁非本部队人员出入，而且在营区内部，特别是在那座进行致命细菌研究与活体试验的副楼中，没有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也不让进入。在“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工作的试验人员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保密教育与考查。“为了保证基地人员不泄漏细菌战机密，每一个来基地工作的人，无论军职文职，都要签下一份誓约书，发誓不向外人透露他们看到听到的一切。就像这里的一个军官对他的部下说的：‘你在这里看到和知道的事情绝不能告诉任何人，就是对父母、兄弟、妻子也不能说’。”“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规定：“士兵们在营区内不能拍照片，即便有只言片语涉及到他们属于一支防疫部队，也要受到军官们的严厉阻止。所有邮件都要接受上级军官的检查。士兵们的行为被尽可能地限制在营区内，目的是将有关一六四四部队的情报封锁起来。”^[12]石田甚太郎在回忆中就讲到他进入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工作时受到多方面的严格审查，部队长官说：“上级有命令，在有关人员中间，严禁对外人说及人体实验的事。”^[13]

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保密工作取得

了很大的成功。它在南京活动6年，一直不停地从事细菌战研究与残忍的活体试验，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而南京当地的居民，包括各届伪政权，竟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而驻南京的其它日军部队则称它为“南京部队的七怪之一”。

二、“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细菌、毒气的研究试验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自1939年4月14日在南京建立后，作为日军细菌战研究网络中“第三个主要的环节”，就迅速而紧张地运作起来，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六年多的时间中，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致命细菌的研究与试验，对细菌战剂的大规模生产，以及直接参与实施对中国抗日军民的细菌战。

哈里斯教授正确地指出：“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基本上是石井部队的一个辅助机构。南京也许偶尔独自进行一些野外实验或其它行动，但它的主要职责是生产病原体，在‘材木’身上试验这些产品，并随时准备石井的召唤。”^[14]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最经常、最重要的工作，首先是对各种致命细菌、病毒及其它各种毒剂、毒素的试验与研究，同时也进行一些化学毒气的试验与研究。

日军要对中国抗日军民实施罪恶的细菌战，首先要研究、培养出大量的能致人死命的细菌、病毒及其它各种毒剂。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检测这些致命细菌、病毒与其它各种毒剂的有效程度及对人体的影响程度等，就惨无人道地、经常性地主要以中国人为对象，进行活体试验。“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并不局限于研究一两种用于细菌战的病原体，与石井从事的研究一样，南京也研究每一种已知的疾病，包括常见病和特异病，简直就像是一部病原体医学辞典和一位杀人动物毒素收藏家的奇特的收藏品。”^[15]当然，“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研究的众多致病与致命的细菌中，重点是研究鼠疫、霍乱与斑疹伤寒菌，在毒物中主要是蛇毒、河豚毒、氢化物和砷等。

细菌与毒物的研究与试验都是在“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总部的那座副楼里进行。

在这座楼的第一层楼分布着各研究室。那些有

军衔的研究人员们,以研究室为单位,“分别从事霍乱、伤寒、鼠疫等研究,所有种类的细菌成百地被放入试管及其它器具、玻璃培养器皿内,然后保管在当时还很罕见的冰箱内,也有很多用于培养细菌的蒸汽锅。”^[16]

第二层楼则“饲养小型实验动物。虱子、跳蚤、小鼠、大鼠、地松鼠等各类实验动物,在这里大量繁殖着。”^[17]为了适应细菌战在野外空投散播鼠疫的需要,还致力于培养“健壮的跳蚤”。哈里斯教授指出:“在南京他们还大量繁殖跳蚤。为了繁殖跳蚤,共享了大约100只汽油桶。随着一个个生产周期的运行,一群又一群的跳蚤从这些汽油桶里蜂拥而出。‘科学者’们生产这些跳蚤大部分是用来进行鼠疫实验,这是南京的特长。”^[18]

这座楼的第三层楼是细菌、毒素的活体实验室。日军的细菌战专家们在这里以活体为对象,分别进行各种致命细菌、病毒与其它毒素的试验,以检测出它们的有效程度与人体对它们的不同反应等,以求不断改进与增强各种致命细菌与毒素的危害力度。石田甚太郎在晚年回忆该部队“用活人来进行各种各样有关传染和毒素的活体试验”的情况时,说:“一科的医生,不仅是尉级以上的军官,也包括随军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总而言之,只要是医生都参加了试验。由医生组成的专门小组,对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病毒以及蜈蚣、蝎子、蝮蛇等小动物的毒液、毒素、毒药对人体会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人体试验。”他还具体地记述了鼠疫菌活体试验室的情况:“在鼠疫菌研究室中,靠中央的地方是监禁供试验用的活人的笼子,稍微靠外面一点,便放置着装有已植入鼠疫菌的老鼠的汽油桶。部队中将这种吸了老鼠血的鼠疫跳蚤作为生物武器大量生产,并进行传播途径的研究。沿房间内的四周墙壁,设置了一圈宽40公分、深30公分左右的沟,里面流动着消毒药水。水就这样不断地巡回流动。这一装置是为了防止鼠疫跳蚤逃逸到房间外面去。”^[19]日军的细菌战专家们将囚禁于笼中的受试者全身裸露,让鼠疫跳蚤侵袭。数日后,日军试验人员从已感染了鼠疫菌的受试者的身上抽出血液去研究,然后杀死受试者。

原“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看守兵松元博在

证言中,叙述了他曾参加活体试验的另一种情况:先给受试者注射细菌剂,然后采血。他说:“这些人关入笼子的第二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生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对中国人的蔑称)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也有便秘者。如果出现了感染者更需要注意。因为不允许他们洗浴,气味很为难闻。”“我们看守兵都穿白衣服,戴口罩,每天开始和结束都要用消毒水消毒。给‘马路大’注射生菌后,每天要测体温,观察饮食,分别记录和报告,……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马路大’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把他们最后的一滴血也吸干。”关于采血,松元博说:“由我负责给‘马路大’戴上黑头罩送往处置室。处置室类似手术室,有手术台,台子两头有捆绑手脚的皮带。把‘马路大’绑在床上,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瓶子,放上标签;然后军医上前动刀,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再插入导管,松开钳子,‘马路大’的血就汨汨地流入瓶子里,直至鲜血流尽;然后军医去敲打‘马路大’的前胸,因为血已经流尽,‘马路大’会很激烈的痉挛,最后在痉挛中死去。更残忍的是,有人穿着皮靴去踩‘马路大’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马路大’死后,处置室旁边有一个电气焚烧炉,把尸体丢进烧掉。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做。”^[20]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朝野富三曾采访过“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人员,记录了毒素活体试验的又一种情况。这次试验是“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部“九研”(登户研究所)联合进行的:把受试者带进试验室,安置在手术台上,穿白大褂的九研人员站在两侧,由翻译告诉受试者,不要害怕,这是日本医生,是专门给你治病的。然后迅速向受试者注入氰氢酸或蛇毒或其它毒物。日军试验人员则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观察受试者的反应。他们看到受试者立即发生痉挛、颤抖,仅数十秒钟,就抽搐,气息奄奄,心跳停止。^[21]

为了验证亚砷盐酸能引起心脏跳动停止的理论是否正确,“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试验人员还用掺

入亚砷盐酸的馒头向多名受试者喂食。这是向人体注射外的又一种活体试验方法。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还有一间带观察窗的毒气室,专门进行化学毒气试验。为了在未来战场上,特别是在坦克战中,使用一种氰氢酸的化学毒气,“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在这间毒气室中多次进行了试验:他们把受试者带进毒气室绑在椅子上,由一位日军医生带着防毒面具进入毒气室,打开盛着氰氢酸容器的封口,然后退到室外,关紧室门,通过观察窗口记录受试者临死前的种种痛苦与挣扎的状况。据美国哈里斯教授考证,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进行的化学毒气武器实验,与石井四郎直接领导的哈尔滨“第七三一部队”在中苏边界地带进行的同类实验同步甚至略早一些。^[22]

这座楼的第四层楼,即顶楼,则是关押受试者的地方。通常关押20-30人,人多时超过100人。受试者多是中国人——被抓获的中国战俘与抗日分子,也有许多无辜的妇女、儿童,还有少数其它国籍的人。关押的房间均有铁窗,称为“开不开的房屋”,由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看守。房间里面的情况,据日军“军画兵”石田甚太郎回忆:“这是一些特别的房间。房间的形状并不像牢房,而是像一个大教室,里面放置着几个笼子。我记得,在……朝南的大房间常放着5个笼子,在西面的小房间里有两个。这些笼子就像动物园里关狮子的笼子,其大小只有一张3尺床铺那么大,里面关一个供试验的活人。不同的时期关押人数会有变化,倘若不够供试验用就再补充。同室内的人能互相望见。”^[23]看守兵松元博则回忆说:“房间内放有7个像鸟笼一样的笼子,长、宽、高各1米,相互间用煤酚槽间隔。‘马路大’以根计算,1个笼子关押1根‘马路大’。我负责的房间关押7根‘马路大’。他们都是南京宪兵队抓来的,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我想是为了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1次。……用纸和布粘成的器皿,里面放食物,筷子也不给,让他们用手抓着吃……。”^[24]

受试者完全被当成动物,日军则称他们为“材木”,即是细菌与毒素的试验材料。他们一旦被关

进这里,就不可能活着出去。他们在试验中被折磨死去后,尸体还要被日军试验人员作解剖研究,最后被扔进一座专门的焚尸炉里焚化。“焚尸都是在夜里11点到凌晨1到2点之间进行的。”^[25]骨灰被深挖掩埋在营区空地下,以防止泄密。直到1998年8月18日,在原“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细菌战剂生产工厂所在地,南京某单位在基建深挖时,还无意中挖到几十具被肢解的尸骨,散发着浓烈的刺鼻药味,经化验,里面含有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有关专家考证断定,这是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当年进行细菌活体试验留下的遗骨。^[26]

由于“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细菌与毒素的活体试验数年中几乎从不间断地进行,因而需要经常地、源源不断地补充“材木”——受试者,即供细菌与毒素试验的中国人,或称“活人体”。该部队的军画兵石田甚太郎在证言中说:“从宪兵队那儿接受活人体,是二科的工作。负责运输的二科的卡车,在深夜从老虎桥的宪兵队那儿将活人体带来。卡车外面盖上罩子,从外面看不见里面,到了部队后,便由二科交给一科。在一科活人体便被关入笼栅内,供医学试验用。”^[27]这些“活人体”都是中国的战俘、抗日军民或无辜民众。1942年10月,台湾籍人士谢金龙曾亲眼见到日军将中国战俘送进“荣字第1644部队”作受试者的情况。战后他为法庭具结作证,写道:“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缘于1942年10月,亲见敌军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受敌日总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广本上尉之命,选送俘虏百余人至中山门内中央医院原址多摩部队,以供残忍之特殊实验,而将其作为秘密研究之牺牲品,结果该百余人全数死亡,无一生存。”^[28]源源不断地补充,接连不断地死亡。据美国哈里斯教授研究判断,南京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在其存在的6年时间里,以活体试验而杀害的中国人超过1000人。他说:“在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有多少‘材木’被牺牲于实验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如按最低估计一星期20名来推算,南京细菌部队存在6年间,因实验共杀害人数至少达1200名。”^[29]

三、“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细菌战剂的大规模生产

日军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霍乱、伤寒、鼠疫、炭疽菌等致命细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对中国军民与其他国家军民的细菌战。因此,它研究的成果必然迅速地转化为批量生产,制成大量的细菌战剂,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武器”与“战术武器”,投入战场。研究与生产同时并举,互相促进,这是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一个显著特点,只有哈尔滨的“第七三一部队”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因此,它也是一家“死亡工厂”。

关于“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培养致命细菌的生产能力,这个部队的第四任部队长佐藤俊二(1943年2月至1944年3月在职)曾在苏联伯力法庭上受审时供认:“我在任‘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长时,领导过本部内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装置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学专家,因而能大规模地培养致命细菌”。关于“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在培养致命细菌方面的生产能力”,佐藤俊二说,“每生产周期内计达10公斤(按:即每生产周期约3-5天,可生产10千克浓缩活细菌浆)。为生产这一数量的细菌,‘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内有如下的技术设备:石井式培养箱约200具,孵育室(容积 $5\times5\times3$)1所,管式营养液消毒器(直径1.5米,长2.5米)2具,孵育器约40至50具,蒸汽灭菌器40至50具,科哈式锅炉约40至50具,此外还有蒸馏营养液的大玻璃蒸馏器,这蒸馏器究竟多少,我此刻记不清楚了。”^[30]

佐藤俊二的交代是基本属实的,与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所派接受人员在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细菌战剂生产工厂所见到的情况基本一致。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致命细菌战剂的生产工厂位于南京城东北角,在九华山下、太平门内,距“一六四四部队”总部约1000米。这里本是旧兵营和靶场,后废弃,成一片开阔地。日军侵占南京后,“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就把这片开阔地占据,四周筑起高墙,围起铁丝网,墙外还挖有水沟,派有日军步哨,隔离防范极严。里面建有许多木板盖的、白铁围的厂房与各种锅炉、制器设备。在北面的九华山内还挖有山洞作储藏室。为了伪装和隐蔽,该

地对外伪称“血清疫苗制造厂”,无任何标志,从不准任何中国人进去,极为机密。四周的中国居民都以为是一家制药厂。这家工厂确实也制造一些血清,还特地养了几十匹马。但这只是遮人耳目的一种副业。它主要从事的,就是根据“一六四四部队”总部研制出的成果与标本,大规模生产细菌战剂——致命的浓缩活细菌浆,以及大量繁殖带鼠疫苗的跳蚤等。

在1943年,有一位叫朱洪文的中国青年因某种特殊原因,得以进入九华山细菌战剂工厂。他见在这里工作的日本人都自称是日军的“科学部队”,官兵都是细菌学专家与大学生,军服上无任何特别标志,全和普通日本兵一样。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日方对这家细菌战剂工厂加以破坏。朱洪文随同国民政府派来接受的国防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主任李振翩教授以及顾德鸿教授、刘冠儒技师等人,再次来到这家工厂。他们见到这家细菌战剂工厂虽经破坏,但仍见到触目惊心的景象。据朱洪文说:“在接受时,那里还有一座像一间房子一样大的高压消毒器残体,其旁装置一座大高炉,用以供给蒸汽;里面有铁轨,一切培养细菌的材料先用车子载进去消毒,可见其制造规模的庞大。”“当时还接受了不少残余的东西。在试验动物方面有2000多只小白鼠和几百只天竺鼠,但不久全部死亡掉了。在培养细菌用的仪器方面有试管、平板各数十万只。温箱(孵卵箱)、冰箱各数十个,铝质培养箱(按:即所谓“石井式细菌培养箱”)数百个。在培养基方面有洋菜(琼脂)30余吨,鱼肉精膏百余箱。据大略推算,每2-3克琼脂可制造细菌悬液20-30毫升,则仅就日寇所余的这一批培养基,就足以制造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3万万毫升。”^[31]接收人员后来将南京这家细菌战剂生产厂尚存的细菌培养原料——琼脂、蛋白胨和牛肉膏等约数十吨运回上海江湾的国防医学院,竟装了10节火车箱,其数量之大实为惊人。国防医学院又将这批原料转给上海生物制品所使用,据说用了十多年还未用完。从这数量大得惊人的细菌培养原料,就可以看出南京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生产细菌战剂的规模与能力是多么巨大。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为了大量培植鼠疫细菌,常常需要先大量培植带有鼠疫细菌的跳蚤,因而常常需要大量供试验的老鼠。因所需老鼠数量巨大,“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除了定期从日本国内调运小白鼠外,还常常在南京就地搜集老鼠。1940年二、三月,“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就曾利用浦镇机厂日籍厂长武藤,下令全厂工人捕捉老鼠。据该厂工人李志扬回忆说:“当时厂里每天集中很多的笼子,有时几百只几千只的运走。”^[32]在日本陆军省军医局医事课课长金原节三大佐1943年4月的业务日记中记载着:“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补充2万只鼠,月生产鼠疫跳蚤可达15公斤。”^[33]

“荣字第1644部队”大规模地生产出来的这些细菌战剂与带鼠疫细菌的跳蚤,为日军在对中国军民的作战中发动细菌战提供了充足的细菌武器。

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直接参与对中国军民的细菌战

南京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不仅是一个研制致命细菌与各种毒剂的试验研究机构与生产工厂,而且还是一支直接参与对中国军民进行细菌战的特殊作战部队。一六四四部队的第四任部队长佐藤俊二供认:“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与关东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一起,曾于日军作战时期,直接参加过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及当地居民的动作……”^[34]日本学者西里扶甬子指出:“1940年以来日军细菌武器在中国投入了实战,南京一六四四部队是起着细菌战实战基地的作用的。”^[35]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中国军民实施细菌战的手法,与七三一部队一样,基本上有如下两种:第一是“地面传染法”,由日特与汉奸,冒充难民,携带制成雪茄烟式的细菌战剂,分别装入蓝、黄、白色的玻璃瓶内,潜入中国军队阵地与广大后方地区,投弃于河、井与厕所中,或掺入淮盐内,广为传播。还有的是派遣细菌战人员随日军进击,当日军退却之际,在行将放弃的地区内向水井、河流与食品中投放。第二是“空中投放法”,由日军派出专机,向中国军队阵地与后方空投带有各种致命细菌的疫蚤、麦粒、粟米、面粉、豆类、布块等。

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进行的细菌战主要是所谓三大“远征作战”,即1940年10月对浙东(宁波、衢县、金华、义乌、东阳)的鼠疫战,1941年11月对湖南常德的鼠疫战,1942年5月至9月对浙赣铁路线的多种细菌战。这三大细菌战都是以哈尔滨七三一部队为主,而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则积极配合进行。石井四郎是这些细菌战的总指挥,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部队长增田知贞、太田澄等人则是石井四郎的最主要助手。

美国哈里斯教授就此揭露说:“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积极参加了石井四郎在中国中部地区进行的三次最盛恶名的细菌战实战试验。南京生产了大量的跳蚤和病原体供这些实战试验使用。增田(按:指“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增田知贞)还为石井的远征队提供了最精锐的人员,并给石井这位友人和恩人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36]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第一次参加对华中战场中国军民的细菌战是1940年10月的宁波鼠疫战。当时日军为切断中国军队所剩不多的海上交通补给线,企图封锁宁波港,乃命令对宁波地区实施细菌作战。这时石井四郎同时担任第七三一部队与第一六四四部队的部队长。在他的策划与指挥下,于1940年10月27日派遣专机入侵宁波地区上空,空投下大量宣传传单与面粉、麦粒等,伴有大量的带菌跳蚤。当地居民发现,这些跳蚤“红红的颜色,种类亦异,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疫鼠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时隔2天,就有人染疫发病。……据查证,在这场人为的鼠疫中,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达106人。其中,宝昌祥服装店户主蒋阿宝及其家属、职工共15人,死14人,仅幸存1人;全家死绝的有12户,计45人。”^[37]在这前后,1940年10月4日,日机在衢县上空撒下混有疫蚤的麦子、粟粒和破布甚多;1940年11月28日,日机在金华上空空投大量跳蚤物等,均使这些地区鼠疫流行,夺去不少中国居民的生命。当地中国政府被迫在疫地烧毁大量房屋。日方史料证明,日军这次对宁波的鼠疫战,是由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从中国东北与南京空运来细菌液体,在杭州笕桥机场换上当地飞机,进行侦察与施放。南京“荣字第一

六四四部队”提供了大量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并派出人员,由太田中佐率领,代号“奈良部队”,直接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的代部队长增田知贞,在作战发动之前,积极协助石井四郎进行诸如作战计划、作战经费、人员分配等工作;在作战过程中,则和井本熊男等人就细菌作战效果等进行研究,还同七三一部队派来的5名专家前往宁波鼠疫重灾区进行调查;1941年2月5日,增田知贞作为重要成员参加了此次细菌作战的总结会。^[38]哈里斯教授对此评价说:“增田在1940年宁波细菌战行动中起了作用,他提供的大量跳蚤用来散布可怕的疫病,几乎毁灭了这个地区。”^[39]

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第二次参加对华战场中国军民的细菌战是1941年11月的常德鼠疫战。常德位于湖南洞庭湖西,既是中国军队占领的重要交通枢纽与战略要冲,又是供应中国军民用粮的粮食生产基地。日军为封锁这个中国粮仓,并向中国四川大后方传播疫情,于1941年11月4日晨,派遣专机于雾中飞抵常德城上空,投下大量装有疫蚤的谷、麦、棉絮及其它不明的物质,使鼠疫不久就在该地区流行,虽经抢救,仍先后夺去106人的生命。

在这次常德鼠疫战中,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再次向石井证明了它的价值:为他在常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野外试验提供了足够的跳蚤和细菌。来自南京的‘科学者’们为石井部队的几架飞机装载细菌,协助他们的平房兄弟们从空中向毫无防备的居民百姓散布了致命剂量的各种细菌。”^[40]在这次鼠疫战中,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不仅提供了一半以上的细菌战人员,而且,这次鼠疫战的总指挥就是新任“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部队长的大田澄。此次作战结束以后,大田澄曾专程到哈尔滨向石井四郎作了详细汇报。^[41]

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第三次参加对华战场中国军民的细菌战是1942年5-9月的浙赣铁路沿线的细菌战役。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使用了多种细菌战剂、杀伤与破坏力度也最大的细菌战。起因是美军在1942年4月初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首次空袭了日本的几个大城市,然后在中国

浙赣一带的中方机场着陆。日军为此决心扫除浙赣沿线衢县、丽水、玉山三个机场,于1942年4月底发动浙赣战疫,在南京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指挥下,以日军第十三军与第十一军的主力部队,分别从杭州与南昌出兵,东西夹攻浙赣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至9月底才基本结束,历时5个多月。在这次战疫一开始,按照日军当局的命令,石井四郎再次亲自出马,带领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与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的成员,组成细菌战部队,携带大量细菌战剂,计有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鼠疫和炭疽菌等多种多样的细菌种类,随日军进入战区,进行细菌作战。

在1942年5、6月战役开始阶段,日军细菌战部队先实施“空中投放法”,即以飞机向中国军队阵地及其后方空投带有各种病菌的粮食、衣物等,以使中国军队人数“锐减”。但由于中国军队迅速后撤,日军进入这些疫区后,尽管事先采取了各种防疫措施,但仍有很多日军感染,造成1700多人的伤亡。于是,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与石井四郎于8月24日在衢州密谋,决定实施“谋略细菌战”——这是细菌战的第二个阶段,即在1942年8月底日军从占领地区作“战略退却”时,由细菌战部队在这些“行将放弃的区域内”,“按军事破坏活动原则”,用各种方法散布细菌。著名的《井本业务日志(1942年8月28日)》较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在浙赣线地区撒播细菌的方法:“在广信、广丰散布带有鼠疫菌的跳蚤和老鼠。在玉山把干燥的鼠疫附着于大米上。在江山,或者把霍乱菌投入井中,或者附着于食物之上,或者注射于水果之中”,等等。^[42]日军甚至利用中国的中秋节,做成许多带有疫菌的月饼向中国居民散发。这就是所谓“地面传染法”。结果造成中国居民更多的死亡。在这期间,日军的两支细菌战部队——“第七三一部队”与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还在浙江义乌崇山村联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细菌人体试验。他们按计划先于9月21日以日机向该山村撒播疫菌,使这个有1000多人的大山村很快爆发鼠疫,迅速蔓延。1942年11月18日,一支日军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打着免费治疗的幌子,诱骗与强迫该村村民到离村1公里的林山寺关押禁

闭,进行活体解剖。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中,崇山村村民因感染鼠疫与活体解剖而死亡382人,邻近村庄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近千人。日军在完成细菌人体试验后,纵火烧毁了该村。^[43]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第一科科长近食秀大为首的调查班是这次细菌人体试验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他们对活动的成果十分满意。^[44]

在1942年夏季对浙赣铁路沿线的细菌战中,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哈里斯教授记载:

1942年夏季在浙江作战(浙赣作战),再次证明了南京对石井及其细菌战事业的价值。……1942年8月,石井从平房飞到南京来参加即将开始的战役。像往常一样,他带领着约120名军官和文职人员。在行动开始之前,又有30名左右平房的专家加入这一伙。石井还携带了100公斤的炭疽菌和副伤寒菌。在全部人员和设备都布置完毕之后,石井要求一六四四部队第3任代理部队长大田澄大佐作后备支援。这是因为,尽管石井有强大的资源,也仍不能满足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大田立即响应。他慷慨地尽地主之谊以满足了他的贵客的要求,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方便。他还为石井补充了病原体供应,并以科技人员补足了七三一部队的欠缺人员空缺。远征队的目的之一是污染敌人利用的全部水源。伤寒菌和副伤寒菌在平房时就被装入豚液瓶中,标签上写着“供应水”,然后用飞机运到南京,送到荣一六四四部队基地,分装到金属制水罐或小玻璃瓶里,然后与七三一和一六四四的技术人员一起载机空运到浙江。这些瓶罐最后分发到士兵手里,由他们负责扔到水井、沼地和居民家中。就是在这次战役期间,两个部队向中国人分发了……掺入细菌的甜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浙赣作战中取得了巨大战果。1942和1943这两年之中,疫病横扫了这个地区。中国平民和军事人员究竟有多少人染上流行病尚不得而知,但有大量的资料证实,仅死亡人数就以万千计。^[45]

日军在华中战场对中国军民先后三次实施的细菌战,不仅在当时夺去了成千上万中国军民的生命,而且其造成的重大危害与影响,数十年后在当地仍

广泛地存在着。

日本“审判细菌战宣传运动委员会”事务局长、著名学者奈须重雄在2006年11月15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学术报告说,据其调查研究,获得了原在“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服役的士官小泽的证言:在1943年夏,小泽曾奉命和4个同伴将带有鼠疫菌的跳蚤装入一个瓶子里,乘飞机在南京郊区某地撒播;在1943年冬,小泽又奉命和同伴,到离南京五、六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撒播伤寒菌。这些撒播致命细菌的地点都是十分保密的,因此后来的效果他们并不知道。小泽还证实,“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曾将用来做细菌活体试验的中国人装在试验瓶里,从南京运到东京的一个试验室里做细菌试验。不久前,在东京挖出一百多具这样的细菌活体试验的尸体,这些尸体的脑袋上都留有弹孔。^[46]

细菌战、化学毒气战等,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推行殖民侵略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南京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研究、试验、生产致命细菌与化学毒气以及直接参与细菌战的罪恶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当局自然深知他们研究与实施细菌战与化学毒气战是严重违反国际公法与人道的严重战争犯罪行为,因此当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即向各细菌战研究基地发出了销毁全部罪证的命令。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迅速执行了这一命令:手头所有的“材木”都被屠杀;总部与各分部的文件、资料多被销毁;设施被彻底破坏与改造,关押“受试者”的囚室与进行人体活体试验的实验室被改造成娱乐室的样子;原先埋在部队营房空地里的数量未及处理的被害者的尸骨被挖出来焚烧,骨灰被抛进长江;在尽可能地销毁了一切能够显示细菌战试验的罪证以后,将细菌战研究人员赶在中国军队进入南京之前设法全部送回日本。^[47]这些细菌战罪犯在战后绝大多数人都逃过了惩罚,并多先后出任日本科研与卫生机构的要职。

时至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侵华战争期间推行的血腥的细菌战与化学战政策及其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与严肃的审判。